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著
Joseph E. Stiglitz

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前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The Roaring Nineties

一部关于全球最繁荣十年的新历史

喧嚣 的 九十年代



中国金融出版社

The Roaring Nineties 喧嚣的九十年代

一部关于全球最繁荣十年的新历史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著
Joseph E. Stiglitz

张明 何璋 译
杨学钰 校

 中国金融出版社

责任编辑：何 为
责任校对：张志文
责任印制：程建国

Copyright©2003 by Joseph E. Stiglitz

The Roaring Nineties i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in 2003.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W.Norton & Company, Inc..

北京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01 - 2004 - 3219

《喧嚣的九十年代》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属中国金融出版社所有，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喧嚣的九十年代 / (美) 斯蒂格利茨著；张明，何璋译；杨学钰校 .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ISBN 7-5049-3537-9

I . 喧... II . ①斯... ②张... ③何... ④杨... III . 经济—
研究—世界—现代 IV . F119.5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5566 号

出版 **中国金融出版社**

发行

社址 北京市广安门外小红庙南里 3 号

市场开发部 (010)63286832 (010)63287107(传真)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fph.com> (010)63365686

读者服务部 (010)66070833 (010)82672183

邮编 100055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尺寸 169 毫米 × 239 毫米

印张 20.25

字数 305 千

版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8.50 元

如出现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序 言

当我在《喧嚣的九十年代》中所描述的美国经济面临的问题第一次浮出水面时，许多海外人士都感到这终于证实了他们的想法：他们过去一直对美式资本主义持怀疑态度。欧洲和亚洲的很多 CEO——尽管他们可能对美国 CEO 的优厚报酬感到嫉妒——感到美国 CEO 的高工资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些见不得人的问题。美国 CEO 看起来并不比他们在欧洲或者亚洲的同行们优秀得多（如果这种差距当真存在的话），但是美国是非常成功的，也许是美国的 CEO 们造就了这次成功，这也许能够给他们的高工资提供一些正当理由。但是即使当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和下滑时，甚至当股票价格直线下降时，他们的报酬仍然在增长，这就加深了局外人的怀疑。理由发生了改变：现在他们不是因为制造增长而受到奖励，而是因为阻止下滑而受到奖励。对美国的失败原因的兴趣之所以浓厚，在于很多人都持有“我一直都知道有什么地方出错了……”的态度，尽管同时也希望从美国的经历中吸取经验教训。

与此同时，在美国国内，美式资本主义的辩护者们似乎经常采取以下立场，即无非是媒体把少数几家企业的错误过分夸大了（媒体总是这样大惊小怪），以及一些在市场上损失了财富的愚蠢的投资者试图把自己的失误归咎于其他人罢了。CEO 们不断强调，危险是一种过度反应，而这将导致过多的管制。

然而，在去年，这两种视角都需要被修正。在美国的自由市场体系中丑闻和腐败比我们过去所看到的要普遍和严重得多。而且尽管其他国家的程度也许会轻一些，每个国家似乎都有它自己的安然公司：意大利的帕玛拉特公

司 (Parmalat)、法国的维文迪公司 (Vivendi)、荷兰的阿霍德公司 (Ahold)。当然, 这些公司的罪恶的性质是不同的。帕玛拉特看起来进行了非常明显的、老套的欺诈——但是那些大型跨国银行究竟是没有能够察觉这一欺诈的手段, 还是事实上与帕玛拉特同流合污, 目前尚不清楚。每一个丑闻都有一个共同主题——新技术与创造性会计以及创造性金融的结合, 已经远远地把察觉这些问题的方法抛在了后面。

在安然公司的案例中, 破产记录为我们深入了解该公司的不正当操作提供了一些最好的机会——这是一个近距离观察公司世界的窗口 (我们在其他情况下也许不能获得)。正如我在本书的后面所提到的, 只有通过大量审阅安然公司的记载, 我们才能够最终明白, 在美国加州电力危机中究竟是哪里出错了——安然公司同其他电力市场交易者一起, 操纵了这一市场。世界通信公司的破产提供了更加不堪入目的场景: 它的银行家们向不谨慎的投资者推销世界通信公司的债券, 而与此同时他们敦促着其贷款部门降低自己的风险暴露。这对那些反对将投资银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合并在一起的批评者们 (包括我本人) 来说, 提供了又一个关于利益冲突的例子。尽管我们对此提出过警告, 但是这些警告被华尔街的说客们以及美国财政部对他们有同情心的官员们彻底压制了。

共同基金丑闻进一步证实这样一种看法: 复杂的金融机构一直在盘剥倒霉的投资者, 而分析师丑闻在其中占有显著位置——分析师们私下里把那些他们向顾客推荐的股票视为垃圾股。通过在下午 4 点买入一种从下午 3 点开始涨起来的股票——而且你能够以下午 3 点时的价格买入的话, 赚钱是非常容易的。这就是所谓市场择机 (Market Timing) 伎俩的一个简单例子。表面上这听起来无非是通过对于股票运动的深刻洞见, 在正确的时机——当股票价格处于低点时——买入股票; 但是经济科学已经证明, 要想战胜市场——即系统性地从股票市场上赚钱——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共同基金通过市场择机手段赚取的收益, 恰好来自其他人——共同基金的其他所有者——的损失。

由于几乎每一家大型投资银行, 每一家大型的审计企业 (以及一些小型

企业)，以及大部分的美国企业都被卷入到这些丑闻中，毫无疑问，对于这些机构的信心将会受到严重损害。但是同样的问题还发生在未充分暴露出来的管制机制的失败上——不仅是企业内部的制衡，即所谓的公司治理体系，而且包括公共机构。在 20 世纪 90 年代，证券交易委员会——它的职责是确保公众对资本市场具有信心，以及中小投资者不会受到不公正待遇——对所发生的一切有所认识。当他们尝试着为此做出一些努力时，他们受到了从这一体系中获益的那些人的打压。但是甚至就连他们也没有充分认识到问题的广泛性。在最近几年里，以下事实变得越来越明显，即证券交易委员会没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有时候是不能胜任，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是缺乏对于自己本职工作的热情。商业界和金融界帮助布什赢得了选举，而且他们期望至少能从这一投资中获得回报；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失望过。

因此，揭开这些丑闻以及对当事人施加处罚的重任，就压在了那些为各州法律执行负责的人们——在这一方面，纽约州的检察长埃利奥特·斯匹兹（Eliot Spitzer）颇为突出。批评家们说他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和自己的前途而这样做，但却忽视了以下事实：他的职责是执行法律，而且他无非是在做自己的本职工作而已。

这些批评家，包括很多金融界的领袖人物，反复强调过度反应的危险，这充分反映了，即使铁证如山，这些人还是不愿意深究这一问题。在他们的心中，问题不在于他们欺骗了那些他们本应该为之服务的人们，而在于他们被抓住了。他们不过是在做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自己的收入最大化，并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甚至也能使股东价值最大化——尽管这更多地是发生在短期内而非长期内。而且这不就是商界中每一个人所应该做的吗？当然，侵占他人利益和过于直接的欺诈会引起道德和伦理方面的问题，但是在利用不知情的消费者方面，他们就采取“货物出门概不退换”的方式！在本书出版后不久，又一桩丑闻把这些道德方面的问题再次带到前台上来，这一丑闻涉及纽约证券交易所及其首脑理查德·格拉索（Richard Grasso）。他的报酬超过了 1.5 亿美元，并且其年度总收入几乎等于纽约证券交易所在 2001 年的净收入，格拉索不甘心让一些在“他的”证交所上市的公司的 CEO 们的收入超过

他自己。他声称，由于他在“9·11”事件发生后成功地使得证交所迅速地恢复运行——这不过是他的本职工作——他应该获得500万美元的奖金——如果考虑到那些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中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的消防人员和警察，他的这一行为就特别令人恶心。但是这一丑闻所披露出来的最大问题却是与自我监管有关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不仅是一个交易的场所，它还被认为证券市场自我监管体系的一部分。交易所应该确保所有的公司和交易商遵循特定的管理规定——从而保证一个公平和有效的市场，特别是保证那些买卖证券的人尽可能得到最优价格。但是如果监管者所要去监管的人投票让这个监管者获得了过于丰厚的报酬的话，谁还会相信监管者会充满热情地执行其监管任务？而格拉索本人对证交所的主要问题之一——那些做市的专门经纪人们——几乎没有采取任何对策的事实，证实了人们的这些忧虑。

这一丑闻暴露了更多的问题。首先，当格拉索的报酬被《华尔街日报》披露之时，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关注或评论。对于美国的企业界而言，这再平常不过了。只有当伦敦的《金融时报》在几个月后把这一故事放到头版头条之后，格拉索的报酬问题才引起了公众的关注。美国的商业媒体是否已经接受了引导着美国金融企业以及其他公司的相同的道德规范？媒体是——或者说应该是——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环节，是使得我们这一体系顺利运转的制衡制度中的一部分。

其次，同样严重的问题出在格拉索本人，以及授予格拉索这一报酬的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的成员们的最初反应上。他们没有看到任何有关利益冲突的问题。他们没有看到任何应该为之羞愧的问题。对于他们来说，这再平常不过了。

最后，也许最为糟糕的是，商学院里的学生们——未来的商界领袖——的讨论。对他们而言，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但是问题不在于所发生的错误，而在于没有处理好公共关系。很明显，未来取得成功并不需要提高道德标准，而是应该确保和媒体之间建立更好的关系，这样他们就能够使事件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

简而言之，我在本书中所讨论的问题并没有远去。它们看起来比我原先

预料的要更加普遍，更加根深蒂固。

即令某些别的国家没有那么多公司丑闻、会计丑闻和金融丑闻，它们中的很多国家也一定经历了与放松管制和不受约束的市场相联系的繁荣和衰退的周期。那些拉美国家和东亚国家受到的损失尤为惨重。在这些国家里，放松管制和私有化造就了非理性繁荣，进而导致大量的资本流入，特别是短期资本的流入，这种非理性繁荣在突然之间就转变为非理性悲观。

我撰写本书的一部分目的是帮助美国人不再重蹈过去的覆辙，另一部分目的是为了帮助美国之外的人们理解什么地方出错了——以及怎样才能在经济和社会中避免这些错误的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里，随着美国经济的繁荣兴旺，很多国家被诱惑着接受美国的指引。正如我在第九章中所评论的那样，美国更加变本加厉——它告诉、说服和哄骗其他国家跟随它的脚步，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一种美国式资本主义的观点——而这种观点和美国国内实际采用的观点，在很多重要方面都存在差别。例如，美国财政部声称，其他国家在公司治理和会计制度方面都应该接受美国的指引。他们在提倡良好的公司治理和会计制度方面是正确的；但是他们认为我们已经找到了正确的模板，这一点却是错误的。这里的讽刺意味是特别深长的，因为他们所采取的立场恰好破坏了良好的公司治理和会计制度。

潮流发生了改变。20 世纪 90 年代标志着金融和市场原教旨主义达到了历史的高点。那些在 20 世纪 90 年代接受了这些思想的人们，现在通常很难抛弃它们。他们说，问题在于我们在改革中没有投入足够的精力，并且在于这些思想的实施过程。但是幸运的是，理智正在逐渐复归。问题不仅仅在于这些思想的实施，而且还在于这些思想本身。如果把本书所说的表示为一个简单的思想的话，那么这就是：我们需要在政府和市场的角色之间建立一种平衡。一个国家既可能从过度管制中遭受损失，也可能从缺乏管制中遭受损失，既可能从过多的公共开支中遭受损失，也可能从公共投资不足中遭受损失；政府能够帮助稳定经济——但是设计不当的政策也可能使得经济波动火上浇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坚持推行的资本市场自由化政策，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经济中的不稳定；即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终也承认了这一点。

对于这些问题更加广泛的理解，意味着各国在经济政策的选择方面应该享受到更大的自由。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最佳道路，也没有所谓的完美制度。本书所讲的故事，暴露了美国版本的资本主义的一些缺陷，但是我很少提及一些更加深层次的问题：巨大的不平等、犯罪人数的上升、很多人所感受到的焦虑和不安全感（包括数百万人没有医疗保障），以及对于环境恶化问题的缺乏关注。其他国家能够决定选择一个更加关注社会中这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而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能够选择一条与目前在美国国内流行的所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应该知道，采取其他模式的市场经济的国家，能够实现一个更加平等、更加安全且具有更好的健康和教育水平——特别对于穷人来说——的社会。

前言

就在十年前，我离开了作为经济学教授在斯坦福大学享有的宁静生活，前往华盛顿，进入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先是作为成员之一，继而担任委员会主席。在此之前，我花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从事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研究。我想看看真实的世界——做一只碰壁的苍蝇。但是我想做的要比这只可怜的苍蝇更多一些。我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窥经济学门径的，那是一个公民权利与和平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我向往和试图改变世界，但是我不清楚如何去做。作为一个学者，我首先需要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

当时我对将会学到些什么基本上一无所知。到了我该离开华盛顿的时候，我已经在克林顿政府第一届班子里干满了整个任期，接着在世界银行担任了三年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一切都发生了改变。这是喧嚣、躁动的 20 世纪 90 年代——充斥着巨型交易和惊人增长的十年。这大多为公众所熟知。但是本书的思想形成于笔者在思考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的过程中。例如，从 1991 年的衰退开始的经济复苏，似乎违背了全球经济学课程中所普遍讲授的规律。得到克林顿政府中部分人支持的广为流传的版本是，财政赤字的削减带来了复苏，然而经典理论认为削减赤字将会加剧经济低迷。再举一个例子，我曾经卷入到很多关于放松管制和会计法规的论战之中，我认为我们放得过头了，特别是在银行业方面。我们也已经错过了改进公司会计的机会。更一般地来说，这十年标志着所谓新经济的出现，生产率与前二十年相比增长了两倍或者三倍。创新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Innovation）曾经是我的学术研究领域之一，我认为弄清楚一点非常重要，即是什么导致了生产率增长速度在 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的显著减速，以及在 90 年代

的重新飙升。

但是在我能够写作一本那样的书之前，风云突变。经济陷入了衰退，有力地证明了衰退这一经济现象并没有消失。公司丑闻把美国式资本主义那些高高在上的传道者们赶下了神坛；美国一些最大公司的 CEO 们似乎把自己的财富累积建立在股东和员工的损失之上。而全球化，即运输成本和通信成本的降低，以及人为贸易壁垒的消除所导致的世界各国之间更紧密的融合，在不久之前还被认为昭示着美丽新世界的到来，现在已经遭到了世界上很多人的仇视。世界贸易组织在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举行的 1999 年年会一度被认为将带来美国领导下的全球新一轮的开放，即一个将以西雅图命名的新的贸易回合——这将成为克林顿为全球化所作贡献的一个永久性的标志。然而事实上，它在混乱和动荡中结束，因为环境主义者，贸易保护主义者，那些关注全球化给贫困人口所带来的毁灭性影响的人们，以及那些对于全球性经济制度的非民主本质忧心忡忡的人们，都加入了游行抗议的队伍。2001 年 9 月 11 日展示了全球化更加黑暗的一面：恐怖主义也能轻易地跨越国界。虽然恐怖主义的根源很复杂，但是世界上很多地方蔓延的绝望情绪和高失业率无疑为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喧嚣的 90 年代的反面降临得如此之快：甚至在克林顿政府离任前就到来了。它为 90 年代所发生的一切提供了新的视角——使得重新解读这十年变得更加必要。

后来的事实是，这一计划尾随着另一件事。我关注的诸多领域之一是政府在社会中扮演的适当角色，特别是在我们这个经济体中。在去华盛顿的几年前，我写了一本名为《政府的经济角色》（*The Economic Role of the State*）的小册子，试图展示政府和市场各自的适当角色，这是建立在它们各自优势和缺陷的基础上。我曾经试图确定一些基本原则来规范政府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在近距离观察政府长达八年之后，我想重新回到这个主题上来。一项关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研究可以为此提供一个机会：克林顿政府的成功可以部分归功于我们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建立平衡的努力，而这种平衡在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十年里曾经消失过；而我们的失误——其中有一些失误要到这个十年结束之后才会显现出来——也部分归因于我们在有些地方没有把握好这种平衡。

在那些提倡政府角色应该最小化的人们，以及那些认为政府应该在更正市场失灵和市场局限，以及追求社会公正方面扮演重要但有限的角色的人们之间，一直存在着思想的交锋和论战。我站在后者的阵营中，这本书就是要解释为什么我认为虽然市场在我们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中心角色，市场自身却并不总是能够顺畅运行；为什么市场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以及为什么政府总是市场重要的合作伙伴。

因此，本书并不仅仅是对于 90 年代经济史的重写，尽管它从某些方面来看是一部经济史。它是过去和未来的故事——它关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发现自己身在何处和走向何方。我们这个社会中很多重要机构的信誉在一些案例中受到了难以挽回的巨大破坏，从教会到 CEO，从司法部门到会计行业再到银行业。在本书中我只关注经济方面的机构，虽然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些发生在经济机构之外的影响深远的事件。

左派和右派都陷入了迷茫。自由放任经济的思想基石，即仅凭市场自身就能产生高效率（不考虑公平）的产出，已经被人们摈弃了。当全球在 9·11 以后陷入危机时，我们认识到我们不得不联合起来。在美国以及欧洲（程度较小）引起震荡的公司丑闻，使保守派也认识到政府的不可或缺。苏联的崩溃使得冷战结束，根除了经济上左倾的基石：对于社会主义的支持，至少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的支持，甚至在那些社会主义曾经根深蒂固的国家中也开始走下坡路。

今天的挑战在于，如何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在地区、国家和全球水平的集体行动之间，以及在政府行为和非政府行为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一旦经济环境改变，平衡就不得不重新建立。政府需要采取一些新行为方式来替代旧做法。我们已经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和人民前所未有地紧密结合在一起。但是全球化本身意味着我们不得不改变平衡：我们需要在国际层面上采取更多的集体行动，在全球竞技场上我们不能逃避民主和社会公正等问题。

我们所处的经济和社会面临的重大变化，在过去十五年里对政府和市场的平衡施加了巨大的张力；而我们在过去缺乏适当的应对。过去几年里出现的问题部分就是对这种应对不当的反映。本书试图提出一种能够帮助我们重建平衡的框架。

本书背后还有一个主题。这是金融至上的十年。华尔街的人们赚得盆满钵盈，他们推动着交易的进行，并且为初创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美国最优秀和最聪明的年轻人都想加入这一激动人心的行业。美国充分体现了市场经济学的宗旨：报酬反映了生产力。那些赚得更多的人对社会回报的也更多。年轻人被吸引到这一热潮中来是很自然的。他们在追逐自身利益时也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

在政策制定的圈子里，对于金融的看法与外界一样充满着敬意。主要由来自金融行业的专家们组成的中央银行的职能被局限于仅仅制定货币政策，他们确保了经济在避免通货膨胀的基础上稳定增长。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的著作《日程表》（*Agenda*）用生动的语言描述了削减赤字是怎样在比尔·克林顿的日程表中走向前台并且成为中心任务的。这并不是克林顿当选时的中心任务，但是有人劝说他，如果不削减赤字的话，金融市场将会惩罚他，没有金融方面的支持，他将不能够实现日程表上的其他目标。结果是其他目标都靠边站了——而且很多目标根本没有实现。

我应该声明：我认为金融很重要。事实上，我自己在信息经济学方面的工作帮助阐明了金融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在此之前，诺贝尔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的弗兰克·莫迪格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与后来芝加哥大学的莫顿·米勒（Merton Miller）认为，除了税收方面的考虑之外，各个公司融通资金的方式并没有什么不同。我在不对称信息方面的工作帮助解释了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中心角色。但是这方面的工作也解释了为什么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场往往运转不顺畅，为什么需要政府，以及为什么对于华尔街来说是有利的东西，对于整个国家或者国内的特定群体来说，却可能不是（事实上经常不是）有利的。

在喧嚣的90年代所发生的，是一系列长期以来适用的制衡——在华尔街、小镇主街（英国叫高街）和劳工之间，在旧产业和新技术之间，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在金融业地位上升的新环境下，在某些重要方面受到了冲击。每个人都对金融业言听计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个国家，被告知要接受市场纪律。长期以来的智慧都不得不“靠边站”：例如存在着多种政策，例如不同的政策对不同的群体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权衡（Trade-off）的存在，例如政治为权衡和选择提供了一个舞台。

在克林顿的班子中，我们知道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如果金融真正至高无上，如果所有政府只能采纳同一套政策的话，那么能将我们与共和党人区分开来的惟一标志就是我们更强的竞争力了。但是一种幻觉占了上风。尽管我们认为我们推行着不同的政策，与共和党人奉行的政策相比，我们的政策能够使贫困阶层和中产阶级更多地从中获益，尽管我们知道权衡无处不在，但是政府班子中的大多数人似乎认为：债券市场，或者更一般地说金融市场知道前行的最佳路径。似乎金融市场除了代表它们自身的利益之外，也代表了美国的最佳利益。这种观点在我看来就是一派胡言。我认为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我们做了一些债券市场或者其他金融市场不喜欢的事情，因此不得不付出一定代价的话，这种代价也许是物有所值的。¹说到底，虽然金融很重要，华尔街也不过和很多其他团体一样，是一个特殊利益团体。

我是作为一个美国人，作为一个曾经参加了美国国内政治争论的人，作为一个深切关注这个国家前行方向的人，来写作本书的。但是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也卷入了世界范围内的相关讨论，以及关于全球化的范围更广的辩论——全球化已经成为目前的热点问题之一。美国的失误——繁荣和衰退、宏观经济政策的操作不当、过度的放松管制以及由此而生的公司丑闻——我认为这不仅仅与美国人利益攸关。本书中的故事与全世界的人息息相关，其中有几个原因。

全球化使得世界上每一个人更加紧密地相互依存。过去我们常常说美国一打喷嚏，墨西哥就会感冒。现在，如果美国打个喷嚏，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可能都会患上流感。况且美国目前的问题远远不止打喷嚏这么简单。对于全球当前以及前十年经济问题的任何分析，都必须从对美国的讨论开始。

1 对于金融市场的迷信并不仅仅体现在赤字削减上。例如，在贸易政策方面，我们担心其对于汇率的影响。甚至在对于汇率的思考方面，金融业的看法也占了上风。低汇率（一美元兑换更少的日元）意味着美国公司能够出口得更多，美国的生产商所面临的外国生产商的竞争就更弱。美国将增长得更快，工作机会将被创造出来——或者说至少不会失去。但是更低的汇率对于华尔街的投机商来说意味着损失，因为他们把赌注押在“强势美元”之上，低汇率还意味着略高一些的通货膨胀，因为进口商品将变得更加昂贵。和其他地方一样，这里存在着权衡，然而争论被金融业所支配，他们只看到了低汇率的负面影响——因此有一次当一位财政部官员被记者问及对于底特律对于强势美元的担忧时——汽车行业发现海外销售，以及与日本进口车的竞争更加困难，他争辩说强势美元将会刺激它们改善竞争力，从而销售得更多。如果他的论点是正确的话，这意味着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发生了逆转。

而且，全球化不仅仅意味着商品、服务和资本更加自由地跨境流动。它还包括思想更加迅速地流动。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在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把自己塑造为世界其他国家的样板。其他国家常常就如何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建立适当的平衡、什么样的制度和政策能够使市场经济运行得更好等问题，征询美国的意见和建议。美国公司的经营惯例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接受，美国也在世界各地推行其会计准则。那些没有主动模仿美国并且认为它们自己的经济也会步入繁荣的国家，包括那些认为美国已经忘记了保持适当平衡的国家，不断地受到引诱和勾引。至于那些依赖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的发展中国家，则被有效地迫使执行那些被称之为历史潮流的制度和政策。

毫不奇怪，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面临着本书中所提到的问题。公司丑闻也涉及一些欧洲公司，把诸如维文迪公司等商业巨人的 CEO 们拉下马来，甚至使荷兰的阿霍德百货商店集团这种看起来循规蹈矩的公司也伤痕累累。在其他地区，公司管理层不正当行为可能没有美国这样明显，但是其发展方向也令人忧心忡忡。

在美国舞台上亮相的其他一些故事也以同样的方式在其他舞台上上演。在其他国家，对于金融及其权力的敬畏感通常比美国还要强烈；关于金融业支配政策的观点甚至决定了选举的结果。对于削减赤字的迷恋，加上近二十年来不遗余力地与通货膨胀作斗争的激情，使得欧洲不得不面对从 2001 年开始出现的经济衰退。在本书付印之际，欧洲经济正面临着通货紧缩的阴影以及不断攀升的失业率，然而正是其先前的行为造成了这次衰退。考虑到日本经济目前也处于停滞甚至更加糟糕的境况，整个世界正面临着全球化时代的第一次全球性低迷。

最为根本的是，两种思想的交锋——即部分人认为政府角色应该最小化，而另一部分人认为要实现理想社会目标的话，政府应该发挥更大作用——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在南北国家之间，在大西洋两岸和太平洋两岸，愈演愈烈。美国近来的经验为所有国家提供了教训，我希望在本书最后几章中总结的经验教训——以及我为未来草拟的行动方案——能够使其他国家和美国一样都从中受到启发。

本书不是调查性报告。我所描述的丑闻和其他问题在别的地方有详细的记

录。²我的目的是阐释，帮助我们了解哪里出了问题以及怎样来进行修补。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我并不认为这些量级问题的出现纯属意外，是个别人异常行为的结果。我一直在寻找系统性的错误——而且的确发现了不少。有趣的是，很多问题都与我这三十年来的研究领域密切相关。它们涉及不完全竞争，特别是非对称信息——这是指一部分人掌握着另外一部分人不知道的信息这种情况。这些理论的进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哪里出了问题以及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它们也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在问题浮出水面的前几年，在克林顿的政府班子里，我一直在同导致这些问题的很多政策作斗争。当这些问题在十年前被提出来之时，最多是一种理论。今天，可以说已经有了确凿的证据。然而在一些部门，人们继续抵制变化，不愿意正视这些问题。³

2 关于此问题有一篇很有见地的文章。参见 Arthur Levitt（前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与 Paula Dwyer 合著的 *Take On the Street: What Wall Street and Corporate America Don't Want You to Know. What You Can Do to Fight Back*（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02）。

已经有好几部书讨论过安然公司的丑闻，参见第十章的注释 1。在 *Pigs at the Trough: How Corporate Greed and Political Corruption Are Undermining America*（New York: Crown, 2003）一书中，Arianna Huffington 对美国公司进行了严厉而又有趣的抨击。另外参见 Jerry Useem，“Have They No Shame?”，*Fortune*, April 14, 2003, pp. 56–64，以及 Janice Revell，“CEO Pensions: The Latest Way to Hide Millions”，*Fortune*, April 14, 2003, p. 68。

3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很幸运地能够从克林顿政府团队的前任们根据自己切身体验写出的众多书籍中，以及一些杰出的新闻报道中获益。它们使得我能够把我自己对于这些事件的回忆和解读，与其他参与者的意见和看法相互佐证。虽然它们大部分都是相一致的，毫无疑问，在一些地方也有着差异，特别是在对问题的解读方面。

我要特别提到一本杰出的著作，*The Fabulous Decade*（Century Foundation Press, 2001），这是由委员会中我亲密的同事，Alan Blinder，以及我作为委员会主席的继任者，Janet Yellen 合著的，这本书更多地强调了对于赤字削减在经济复苏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经典解读。对这方面更多的学术研究，可以参见 Jeffrey A. Frankel 以及 Peter R. Orszag 编著的 *American Economic Policy in the 1990s*（MIT, 2002）。在众多回忆录中我发现对我来说最有帮助的是 Arthur Levitt 与 Paula Dwyer 合著的 *Take On the Street*，前任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 Reed Hundt 所著的 *You Say You Want a Revolution: A Story of Information Age Politics*（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以及 Robert Reich 的 *Locked in the Cabinet*（Knopf, 1997）和 George Stephanopoulos 的 *All Too Human: A Political Education*（Little, Brown, 1999）。在对于克林顿任期内的报道中，Bob Woodward 所著的 *The Agenda* 提供了对于预算争论的详细讨论，他的另一本著作 *Maestro: Greenspan's Fed and the American Boom*（Simon & Schuster, 2000）提供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对于繁荣的解读。Elizabeth Drew 的 *On the Edge*（Simon & Schuster, 1994）以及 *Showdown: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Gingrich Congress and the Clinton White House*（Simon & Schuster, 1995）中就前两年提供了一个详尽的探讨。其他书包括 Joel Klein 编著的 *A Day with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Leading Business Issues*（Washington, DC: National Legal Center for the Public Interest, 1997），以及 Steven E. Schier 编著的 *The Postmodern Presidency: Bill Clinton's Legacy in U.S. Politics*（Pitts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正如在我以前的一些著作中一样，我真诚地感谢威廉·杰斐逊·克林顿总统，是他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不仅能够为国家服务，而且能够看到关于美国政府的第一手资料。对于一个社会科学家来说，这是难得的际遇。

我之所以非常感谢总统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给予我这个机会，还在于他对于经济顾问委员会在我们政府体系中扮演的特殊角色所表现出来的尊重。我们的奢侈在于没有任何赞助商——只有美国人民，他们才不会在意我们的言行举止呢。这给了我们一种其他政府部门所缺乏的自由度，因为这些政府部门一直承受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利益集团的压力。本书的主题之一就是个人对于激励所做出的反应：那些在公司和金融圈里行为不良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格外邪恶的，或者说并不比在更早时候处于他们位置上的人更邪恶；真实的情况是，他们所面临的激励是不同的，因此他们针对激励所做出的反应也不同。在经过训练之后，我们这些经济顾问委员会中的成员更加适合去寻找设计不当的激励机制，但是那是我们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有动力去发现激励中的问题——这样做加强了我们在自身行业中的声誉。与之相类似的是，我们有动力不向特殊利益集团的压力让步，因为那样做会使我们的声誉受到损害。委员会中的成员绝大部分来自学术界，他们最终也将回到学术界，在这个圈子中的声誉对于他们来说是最为重要的。

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的职务不仅使我能够近距离观察政府决策制定过程，它还给予我一个独特的机会，使我能够为美国经济服务。我的日常工作职责不仅仅是调控当前的经济运行，还需要思考什么地方将会出问题，以及在问题暴露前努力去修复和避免。我能够从各种角度来观察美国经济，这种机会是不常见的——我们既能够与企业、政府和学术界的所有顶级经济学家们进行讨论，征询他们对于美国经济运行的不同见解，也有机会同工会领导人、CEO、风险资本家以及华尔街的分析师们交谈。总统的工作很努力，他试图随时知晓经济变化对普通美国人的影响；他在亚特兰大、波特兰、哥伦布以及其他城市召开过区域性经济峰会。我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倾听他们关注的意见，以及解释我们正在做什么。这些频繁的会谈使得我与大众保持着密